

藝 文 新 輯

新 北 京

黃 裳



藝文新報
新北京

黃裳

上海出版公司

目次

新北京

知識份子的改造.....	五
老舍在北京.....	一三
一支文化隊伍.....	一八
瞻望新歌劇.....	二二
漁夫恨及其他.....	二九
談戲.....	三三
溫特.....	四二
老虎尾巴.....	四六
三入清華園.....	五三

百順胡同的郭佩珍.....五五

京塵瑣錄.....六六

解放後看江南

米之都——無錫.....七七

絲是怎樣織成的？.....八二

榮德生和無錫的棉紡業.....八九

社會科學者眼裏的南京.....九九

司徒夾着皮包走了以後.....一〇四

不再做花瓶.....一〇九

侯德榜與永利.....一一四

後記.....一二三

新
北
京

懷着無比興奮的心情，來到了新都，車子過了永定門，遠遠看見哈德門的城樓，北京城籠罩着一層霧。太陽探出頭來，霧慢慢給澄清了。金黃色的陽光照耀在路上，路上走着牛車、駱駝。太陽光照在紅牆綠瓦的廟宇上，發着閃爍的光亮。心裏有說不出的衝動。

一路在想，北京這個古老的城市，歷史的負載可太沉重了。正好像『沙鍋居』的據說流傳了幾百年的『白肉老湯』，裏面有多少朝代的歷史的陳渣；正像一個浸透了的醋罈子，有洗不清的積鏽。一千多年的專制王朝的統治，給這個城市留下多少封建制度的『精粹』。簡單的數一數，這裏曾經作過異族的統治中心，曾經爲帝國主義者聯合地踐踏過，曾經過帝國主義的爪牙的長期統治。多少年來中國人民的災難，多半是從這個城市出發的。

象徵着這個專制的腐敗的神祕與『莊嚴』的是那些高高大大的多少勞動人民的奴役造成的建築物。在這裏面聚積了成年累月從人民那里掠奪了來的財富。

爲了便於統制，就又奴役了知識份子。養成了一種特殊的階層。利用種種方法，養成了使一般知識份子都有着作『一人之下，萬萬人以上』的幻想，至於那實踐，就是更惡毒的殘酷的統制的執行。這就是『士大夫』階層，更通俗一點的名稱是『京官』。和更高雅的名爲『清流』其實是狗頭軍師的人物。這個影響也大極了。逐漸成爲全國性的、歷史性的。北京

就是這樣一個專制統治工具的培養造成所。

不只是掠奪了人民的財富，一種物質上的掠奪；此外，更還掠奪了人民的精神上的食糧。人民的趣味，人民的藝術都給拿來，重新製造過，成為配合統制階級的口味，也更便於思想統制的藝術型式與作風。至今，最普遍的民族戲劇型式還是『京戲』；有名的角色稱為『京角』，再演變而成為一般性的『京朝派』。由北京出發，就等於有些人的『出洋鍍金』。這一種影響，對於民族文化的本質，可以說也大極了。

再看看，這個曾經作過多少年如海的『帝城』的所在，奴隸制度發展到巔峯的狀態之下，自然就是賣淫制度的存在。把人不當人，女性成為販賣的對象。甚至於男人也成為賣淫的商品——所謂戲班裏的演員的『相公』。

這真也可以說是北京的『特色』，沒有比這個表現得更清楚的封建社會的惡果的了。而在過去，這是普遍地為官僚與『名士』所欣賞玩弄着的。

北京解放已經一年，作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首都也已經五個多月了。全國的人民都關切着北京的改變，北京的新姿態。

從專制封建王朝的帝都成為人民的首都，這個翻身可够大的。在當前，全中國的人民都

在翻身，幾萬萬雙眼睛都在注視着北京的一舉一動。這一個大翻身要帶起來多少被壓迫的被剝削的受侮辱與損害的；要打垮多少要不得的，罪惡累積的制度與作風。

這一條線是怎樣連接起來的？歷史是發展的而不是飛躍的。新與舊相隔如此之遼遠，這條線絕對不可能是一條直線。這中間有多少曲折，有多少艱苦。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完成了這個偉大工作的奠基的？

想得多極了。心情也衝動極了。火車進了東站，提着旅行包下車，走出車站，就首先碰上了迎面吹來的一陣陣的風沙。從縫縫着的眼睛裏看見了正陽門和中華門的城樓。呀，這是北京，這還是我們熟習的北京呀，可是不，不敢說熟習你，認識你，得好好地仔細地瞭解瞭解，呀，你，新北京！

知識份子的改造

馮友蘭

在這個大時代中，整個的社會和社會中間的個人，都在進步着。而這中間的知識份子的改造，更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事。

要知識份子丟掉他背上了多少年的包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這過程中有數不盡的痛苦和鬥爭，有許多例子，是值得介紹的，可以給旁的知識份子作一個參考。

清華大學的馮友蘭和吳景超兩位教授的轉變經過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事。

先回想一下三年前在重慶所看到的馮芝生罷。

這是一位中國「正統派」的哲學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和他的行運似乎跟他那山羊鬚子是不可分割的。不過四十多歲，却早已留起了挺漂亮的鬚子了，襯着那件大褂，就正是一

個標準的「師表」姿態。

他又正好是南陽（河南）人，和諸葛亮是同鄉。我想這并非偶然，和他的過去的作風很有點關係，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照他自己所說，是所謂「貞元三書」。照他最近在「學習總結」中的解釋，這套「新理學」是作為一種「不願意變的人的一種寄託」的，不過事實怕并不如此消極，相反地，他正是要把這一套作為應帝王的寶貝，青年的思想南針的吧。在中國的思想戰線中間，這是和新哲學打對台的一隻勁旅。

在三年前，我也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是不是馮先生注意過外面對你的新著作的批評？」當時他的態度，和他最近的文章裏所說的是相同的：「我以前必定有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不自覺的態度。雖然自以為很謙虛，實則是很驕傲。」他根本就不看批評，或不理批評的。他有一套特別冷靜的姿態，我想過去中國的道學家大概就是這種樣子的。在他的住宅的客廳裏就掛着這樣的對聯：「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請想一下，這樣的一位哲學家，在最近發表「一年學習的總結」的文章以後，下鄉去參加土改工作去了。

這轉變不能不說是驚人的。

至於怎樣能夠得到如此的轉變，羣衆的力量是不能忽視的。馮芝生在他的「一年學習的

總結』裏有幾句話說得很值得回味的：

『一個社會到了不得不變的時候，不願意變的人，總想抓着一個思想上的什麼東西，以爲寄託。』

什麼是知識份子的可以抓着做爲寄託的東西呢？那就是過去的那一套『思想自由』，『學術自由』……以致這樣發展下來成爲『民主個人主義』者的那一套。

在北京，如果要講學術自由，北大的前例，蔡子民先生的思想與作風，就是最容易給這些知識份子抓住的一點。他們很現成而方便的把這個拿了來做了逃避現實的擋箭牌。其實社會是發展的，蔡先生主持北大，那立場是一向在反帝反封建的主題之下標榜自由的。這是十分清楚的事情。北大也一向保持了這個傳統，永遠是進步勢力的前趨。可是在蔣蔭等制的末期，北大落到了不肖的胡適手裏，他就會用『學術自由』的口號要學生不問政治讀死書了。

像馮芝生這樣的學者，在解放以後雖然現實逼他不得不脫離了反動的陣營，可是學者的自尊自信還是有的，起碼在清華園裏他還是文學院院長、哲學系主任，還是有他的『自由』的小天地的。他還儘可逃避，儘可『退隱』，然而，羣衆是嚴厲的，在他自己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

「以批評及自我批評而論，現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必與羣衆聯合起來，與以前道學家專在靜室中『克己省察』意義就大不相同。而且真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比以前道學家在靜室中所想像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嚴得多了。」

馮芝生就是這樣左解放後才第一次認識了羣衆的力量。認識了羣衆的「嚴」。他不得不放下了校委、文學院長和哲學系主任的工作。這一下打垮了他的自信，打掉了他的威風——這都是知識份子的包袱。經過了若干時日的冷靜與寂寞，他寫了信給毛主席說，他不願意做一個『盛世之遺民』，他志願學習、改造，希望羣衆能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

毛主席馬上回了他的信，告訴他知識份子的改造是得慢慢來的，歡迎他努力學習。他很感動，碰見朋友就拿出這封信給人看。他有了澈悟的始基，然後羣衆再在這個基礎上幫助他，他有了進步，承認了過去的自己的立場是地主階級的立場，自己的作風是個人主義和英雄主義的作風，他接受了批評，他寫了『思想總結』，他下鄉參加了土改工作。

對馮芝生的新作風，不成問題，羣衆是絕對歡迎的。

吳景超

吳景超這個名字，自從獨立評論時代開始，就爲大家所熟習。他是一直站在『京派』學

者的陣營中間的，因為所學所講授的東西是社會科學，所以更應該為大家所熟習，要說學者，他才真不愧是一個學者，或者更合適一點說，是書齋裏面的社會學者。他在解放以前為大家所熟知的事業是辦了新路周刊。當時他的主張與看法也大半發表在這個刊物裏。最「膾炙人口」的論法，我記得的還有兩則。其一，他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解釋中國的人口問題，結論是說只要中國人死去（不論用什麼方法）四分之三還是多少，問題就可以解決了；其次，他曾經利用過美國國務院的數字，說明美國與蘇聯的平均貧富所得，以為蘇聯的數字還不及美國，於是結論就說蘇聯的制度確是不及美國的制度好了。

很容易地看得出來，他過去的反蘇，還跟一些國民黨匪幫的論評家有些差別。那就是，他處處利用學說、利用數字，純粹是書齋裏的產品、是「學者」的行為。當時看了上述的那種看法，大概沒有人會不奇怪，怎麼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來的呢？大概只有所謂「學者」才能做得出這樣的事來的吧。

這一次在清華看到吳景超，又是在清華的極漂亮的圖書館的地下室的社會科學研究室中，這是一間間的小房間。推門進去，一位瘦長戴着深度眼鏡穿着大衣的人在堆滿了洋書的櫃子旁邊站了起來。這就是他，他用纖長而白的手指將桌上的一架小型打字機推開，關上了

滿滿裝着的卡片箱，坐了下來，我們交換了一次談話。

他現在是清華大課的教授之一，他講過兩個題目：『國家與革命』和『社會主義與新民主主義革命』。

我們的談話還是先從讀書談起，他隨手從座位旁邊的小木書架上抽出了兩厚本紅布面精裝的英文本馬克斯的資本論，他說這還是在新路沒有出版以前從美國買來的。還給我看了書裏夾着的發票。『當時想要和新經濟學派打筆墨官司，想想如果不弄清楚他們的一套，就實在很不够澈底。於是，就想法從外國買了資本論來，想法仔細讀它一遍。』一九四八年暑假中看完了第一本，到寒假北京圍城期中才看完了第二本。他還指給我看書裏面用紅鉛筆畫的擇要和附注的意見。

讀書的成績是一篇馬克斯論危機的文章，印在清華大學的社會科學季刊裏。

他說起過去的那些荒謬的看法，都出發於對蘇聯的偏見。他在一九三七年從美國回來，曾經路過蘇聯，住過兩個月。正巧那時候蘇聯在清黨，他沒有能作任何對蘇聯的了解，只留下了一份恐怖的印象。至於他對美國的印象之造成，又是很巧合的。從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八年，他在美國，當時美國正是繁榮的時代，根本沒有接觸到失業和危機的問題。一九四三到

一九四四兩年他又到美國，又趕上了繁榮。所以他所看到的美國，只是這一面，完全沒有能看到那另外的一面。

他說這真是受了騙了。從這裏又說到他在美國的統計數字中間又上了大當的事，原來就是在爲『學者』認爲百無一失的學術性奇濃的統計數字中間，也還有階級性存在。在一本美國出版的雜誌——Current Business還是什麼呢？——裏就有這種例子。它報導美國每年的生產數，有一九四一年的，一九四五年的，可是就不提一九四三年的。因爲那年的數字最高，一寫出來，就會顯出了美國社會經濟的萎縮與退化。

他過去的學說就原來建築在這樣的基礎上面。

他又說明過去的看法是太不辯證的了。拿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將近崩潰階段的美國的產量跟建國期中的蘇聯來比較，根本是不公平的，存有偏見的。

自從解放以後，他才對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策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最近因爲上大課，他又重新整理了資料，他抽出了他的卡片箱，那裏面是一張張排滿了的卡片。他取出來一疊，說這是他上課所講的教材。他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每一點都拿來細細地比較，這樣，他才發現了社會主義本質上的優越性。

這種上大課的方法，對他的影響太大了。在清華的大禮堂中，聚集了教授、同學、工友三千多人在一起，有六七個擴音機。他這才發現，對羣衆講話、寫作，是要負責的。過去的那種關起門來寫文章的作風是完全地錯誤了。

第一次大課講完，同學還沒有反應，黨團有過批評。這種批評，如果不是經過了半年多以前的修養，是一定會感到不舒服的。他的看法轉變了，要公開批評，在第二次大課開始以前，先找了黨團裏理論基礎比較好的人來批評，他接受了批評，修改了講演，這樣，他覺得多少好一些。

最後他還說起他最近所發表的那一篇「學習總結」，說那不够深入，不够坦白。「我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子高中三，一個女孩子是高中二了。他們是候補黨員和團員。他們回家以後就把我大批評了一遍。別看那些小孩子，他們有時候雖然天真的批評却往往能擊中要害，够深刻的！」

老舍在北京

我這一輩子在上海演得挺起勁，我願意提前報告一下，原作者老舍先生在北京的近況。頭一次看見老舍是在玉華台飯館裏，客人差不多都到齊了他才來。茶房掀起門簾，我們就看見在院子裏走進來一位中等身材胖胖的人，穿着皮大衣，走起路來一歪一歪的，不大得勁。進門一脫大衣，他上身穿着一件綠呢西裝。裏面是大紅黑花的呢襯衫，就像美國西部的牧童的裝束，底下穿的是兩條藍綢子棉套褲，紮着褲腳。太現成了，說明了這位老北京剛從美國回來。

他在美國得了腿病，嚴重得路都走不動，一天到晚總是躡在北京飯店樓上。他說：『我真喜歡吃點燒餅果子，可是，出了飯店，走到東單（普通人三分鐘的路程）我就得走上半天，還得歇四五回！唉！』

這位老北京還不脫他當年的風趣，大家都問他美國的近況，他一杯一杯喝着黃酒，話匣